

Reclamação nº 9/2019

I – Relatório

No âmbito dos autos de execução ordinária, registada sob o nº CV3-07-0022-CEO, que correm os seus termos no 3º Juízo Cível do Tribunal Judicial de Base, de que é exequente Banco YY XXXX, S.A., e executados Fábrica de Artigos de Papel e, Limitada., A e B, foi pedida a penhora pelo banco exequente das quantias, no valor de MOP\$10.000,00 por cabeça, da comparticipação pecuniária de 2019, de que beneficiam provavelmente os executados A e B.

Por despacho datado de 22NOV2018 do Exmº Juiz titular do processo, foi indeferida a pretendida penhora nos termos peticionados.

Inconformado o exequente, desse despacho veio interpor recurso ordinário para esta 2ª instância.

Por despacho do Exmº Juiz *a quo*, não foi admitido o recurso com fundamento na inferioridade do valor da sucumbência à metade alçada dos tribunais de primeira instância.

Notificado do despacho que não admitiu o recurso por eles interposto, vem, nos termos do artº 595º/1 do CPC formular a presente reclamação dizendo que:

YY XXX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葡文名稱為： BANCO YY XXXX , S.A., 前中文名稱為：XXXX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前葡文名稱為： BANCO XXXX, S.A.), 為題述卷宗之請求執行人，身份資料詳載於題述卷宗內，鑑於請求執行人對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 閣下於題述卷宗第291頁之批示中駁回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2月6日提交的上訴聲請的決定（參見附件

一，以下簡稱“駁回上訴聲請之批示”)不服，現謹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95條及續後條文之規定，向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提起本聲明異議。

相關之事實及法律依據如下：

1.º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於2018年11月15日發表的澳門201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永久性居民將於2019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放現金分享款項的金額為澳門幣10,000元。

2.º

考慮到本案之被執行人A(A，持有第*****(*)號澳門居民身份證)及B(B，持有第*****(*)號澳門居民身份證)均為澳門永久性居民，有權(又或至少可合理期待該兩名被執行人將有權)收取上述現金分享款項；

3.º

同時，亦鑑於根據法律對查封之規定，較早提出查封者之順位優先於較後提出查封者，而目前於初級法院第二民事法庭尚有另一執行案亦正針對上述兩名被執行人進程序，在該另一執行案中，該法庭一般會於每年的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獲公佈後便應聲請向財政局發出全數查封上述兩名被執行人翌年將獲發放的現金分享款項的命令(參見附件二之卷宗第204頁、第218頁、第239頁、第258頁、第267頁以及第282頁)；

4.º

故此，基於訴訟代理人之謹慎以及職責所在，同時亦為了維護請求執行人的利益，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747條(對取得權或取得之期待)之規定，申請查封上述兩名被執行人於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將獲發放之款項(澳門幣10,000元)，並請求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 閣下盡快去函財政局，以便適時查封上述兩名被執行人各澳門幣10,000元之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款項(參見附件三之卷宗第284頁，以下簡稱“**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請求**”或“**查封請求**”)。

5.º

其後，尊敬的初級法院法官 閣下(以下簡稱“**原審法官 閣下**”)於2018年11月22日作出批示(參見附件四之卷宗第285至287頁，以下簡稱“**被上訴批示**”)，除了以請求執行人所聲請查封之相關款項屬“政治承諾”(promessa política)，其並非一項“權利”(direito)或“法律上之期待”

(expectativa jurídica)為依據，駁回上述之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聲請外(以下簡稱“**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更判處請求執行人須支付4UC作為“重複聲請之附隨事項”(“*Custas do incidente pela reiteração do requerimento. Taxa de justiça 4UC – Cfr. fls. 249*”)之訴訟費用(以下簡稱“**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

6.º

鑑於請求執行人對“被上訴批示”當中之上述兩項裁判(包括上述之“**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以及“**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不服，因此，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2月6日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第1款補充適用經必要配合後的《民事訴訟法典》第581條第1款、第583條第1款、第585條第1款、第591條第1款及第593條第1款之規定，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聲請(參見附件五，以下簡稱“**上訴聲請**”)。

7.º

此外，由於可合理地預期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款項將一如既往地於2019年7月初開始發放，倘若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817條第1款c)項之規定留置上訴，將使上訴絕對無用，故此，請求執行人亦於上述上訴聲請中同時主張，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第601條第2款、第604條及第607條第2款a)項之規定，該上訴須立即及分開上呈，具中止效力。

8.º

然而，原審法官 閣下於2018年12月21日在題述卷宗第291頁作出批示(參見附件一，以下簡稱“**駁回上訴聲請之批示**”)，當中認為“被上訴批示”涉及的總金額不超過《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所規定的“因裁判而喪失的利益值(sucumbência)”(以下簡稱“**喪失的利益值**”)，亦即是澳門幣50,000元的一半，故屬不可上訴者，因而駁回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2月6日提交的上述上訴聲請。

9.º

除對“**駁回上訴聲請之批示**”之見解給予應有之尊重外，請求執行人並不認同。

I、關於就“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提起之上訴

(一) 該上訴應補充適用經必要配合後的《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之規定，且無須考慮“喪失的利益值”

10.º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由於《民事訴訟法典》關於執行程序的規定中並沒有就駁回查封請求之批示的上訴作出任何規定，因此，須根據《民事訴訟法典》375條第1款之規定，補充適用經必要配合後的規範宣告訴訟程序之規定。

11.º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可提起平常上訴之裁判)第1款之規定：

“一、**除非另有規定**，僅當案件之利益值高於作出上訴所針對裁判之法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且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不利於上訴人之主張，而該裁判對其不利之利益值高於該法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一半者，方可提起平常上訴；然而，如在因所作之裁判而喪失之利益值方面存有合理疑問，則僅考慮案件之利益值。”(粗體和底線為我們加上)

12.º

而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之規定，“對駁回起訴狀之批示得提起平常上訴，即使案件利益值不超過第一審法院之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亦然。”

13.º

誠然，原審法官 閣下之所以於“被上訴批示”中作出上述之“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是由於認為行政長官透過2018年11月15日發表的澳門201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內承諾向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發放的2019年現金分享款項屬於一項“政治承諾”(promessa política)，其並非一項“權利”(direito)或“法律上之期待”(expectativa jurídica)，故認為請求執行人提出之上述“查封請求”明顯不能成立。

14.º

故此，請求執行人認為就“被上訴批示”之“駁回查封現金分享之請求之決定”，與《民事訴訟法典》第394條第1款d)項之“初端駁回起訴狀”之情況相近，故此可補充適用上述《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之規定。

15.º

而根據由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終審法院利馬法官所著及經葉迅生檢察長和盧映霞法官翻譯之《民事訴訟法教程》第二版譯本，第104頁，註腳882之關於《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之規定，尊敬的終審法院利馬法官 閣下認為：“所出現的問題是，基於第583條第1款的規定，在此情況下，上訴所針對的裁判不利於上訴人之主張，而該裁判對其不利的利益值不高於該法院的法定上訴利益限額一半者，那麼，是否仍得提出上訴？本人傾向認為得提出上訴；以喪失的利益值作為是否接納上訴的準則，僅在對第242/85號法令進行改革時，方引入我們的法律制度中，由於該次的改革內容有限，亦可以說是僅為了引入上述內容，故此，立法者並沒有對1961年《民事訴訟法典》第475條第1款的規定作出更改，順理成章，立法者在現行《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中，保留了上指條文的內容；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的規定，對於所有駁回起訴狀的批示，均得提起上訴，因為對於初端駁回原告起訴狀的情況，被認為均須讓第二審級的法院就此問題發表意見，因此，即使原告所喪失的利益值不高於被上訴法院法定上訴利益限額的一半，仍得提出上訴；換言之，對於第395條第1款d項所指的情況，無論如何均得提出上訴；(...)”。(粗體和底線為我們加上，參見附件六)

16.º

基於此，就“被上訴批示”當中“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第1款補充適用經必要配合後的《民事訴訟法典》第395條第1款之規定，屬於可向中級法院提起平常上訴者，故此，謹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裁定請求執行人提出的上述“上訴聲請”應獲受理並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601條第2款之規定立即上呈。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並不認同上述主張(這純屬假設)，則請求執行人繼續提出以下另一依據：

(二) 中間上訴之受理不應考慮“喪失的利益值”

17.º

誠然，“被上訴批示”所作之上述兩項裁判（即，上述之“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以及“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皆並非引致本執行案訴訟程序終結之裁判，因此，針對該批示作出的上訴屬於中間上訴。

18.º

除對相反見解給予應有之尊重外，就中間上訴而言，不論是屬於延遲上呈抑或是立即上呈者，由於在中間上訴提起之時尚未出現任何引致訴訟程序終結之裁判，故此，在該階段決定是否受理上訴時應無須考慮《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所規定之“喪失的利益值”。

19.º

首先，針對在訴訟過程中提起的須延遲上呈的中間上訴方面，從《民事訴訟法典》第602條第1款之規定可見，由於該類中間上訴並不會立即上呈，而是須連同在其提起後之首個須立即上呈之上訴上呈，故此，在決定是否受理該類中間上訴時，只須考慮案件的上訴利益值，而無須考慮“喪失的利益值”。

20.º

至於針對在訴訟過程中提起的須立即上呈的中間上訴方面(尤其是《民事訴訟法典》第602條第2款所規定之“留置上訴將使上訴絕對無用”之情況)，由於該類中間上訴基於各種原因以致不能留待至出現引致訴訟程序終結之裁判時方一併被審理，故此，在決定是否受理該類中間上訴時更不須考慮“喪失的利益值”。

21.º

基於此，謹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裁定請求執行人針對“被上訴批示”作出之“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聲請”以及“判處訴訟費用決定”而提起的中間上訴應獲受理，並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第601條第2款、第604條及第607條第2款a)項之規定，該上訴須立即及分開上呈，其中止效力。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不認同上述主張(這純屬假設)，則請求執行人繼續提出以下另一依據：

(三) 宣告之訴的平常上訴當中有關“喪失的利益值”的規定(《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不應補充適用於執行之訴的訴訟程序中針對每一項獨立的查封聲請所作出的駁回請求的決定

22.º

正如本聲明異議第10條所述，由於《民事訴訟法典》關於執程序的規定中並沒有就駁回查封請求之批示的上訴作出任何規定，因此，須根據《民事訴訟法典》375條第1款之規定，補充適用經必要配合後的規範宣告訴訟程序之規定，然而所適用之規定**必須是與執行之訴之性質不相抵觸者**。

23.º

宣告之訴中之給付之訴，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1條第2款c)項之規定，旨在因權利遭受侵犯或預料一權利遭受侵犯而透過該訴訟獲得一項要求給付一物或作出一事實之給付判決。

24.º

至於執行之訴，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11條第3款之規定，旨在請求法院採取適當措施以確實彌補受侵害之權利又或直接實現請求執行人針對被執行人享有的一項債權。

25.º

誠然，在執程序中，請求執行人為了實現其債權，往往必須適時地針對被執行人於不同的時間點被發現的財產馬上提出一項獨立的查封聲請，而在被請求執行之債權仍未透過執程序獲全部實現之前，法院於不同時間所作出的任何一項駁回查封請求的獨立決定，事實上均直接地影響對請求執行人在相關執案中請求執行的整項債權的實現。

26.º

試想想，即使是執行聲請獲接納而被執行人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但倘若請求執行人不獲法院批准其為實現債權而請求法院命令作出的各項查封、變賣又或其他針對被執行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的措施的聲請，則請求執行人請求執行之債權根本無法透過該執行訴訟程序獲得實現。

27.º

故此，除對不同之見解給予應有之尊重外，請求執行人認為宣告之訴的上訴當中有關“喪失的利益值”的規定(即，《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不適用於請求執行人針對“被上訴批示”之“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提起的上訴。

28.º

請容許請求執行人舉出以下例子以說明之：假若請求執行人於案中請

求執行的金額為澳門幣十萬元，而被執行人存在五項價值各為澳門幣兩萬元的財產，但由於可被查封的財產被分別匿藏以致分別於不同的時間點被發現，而請求執行人針對各項財產分別於不同的時間點提出了一項獨立的查封聲請(即，前後合共五項不同財產的查封聲請)，那麼，倘若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當中有關“喪失的利益值”的規定，則意味即使法院駁回該五項查封聲請，請求執行人亦不可上訴，這顯然並不合理。

29.º

由此可見，倘若《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當中有關“喪失的利益值”的規定，適用於法院在執行之訴的訴訟程序中針對每一項獨立的查封聲請所作出的駁回請求的決定，將導致執行之訴中大部分為滿足債權而提出的多項查封聲請均由於“被聲請查封之財產之價值不足澳門幣25,000元”不可被上訴(而現實是，該等透過多個獨立聲請被請求查封的多項財產所涉及的總金額事實上已遠遠高於澳門幣25,000元)，這不僅導致請求執行人的上訴權嚴重受損，亦令到請求執行人請求執行之債權無法透過該執行訴訟程序獲得實現，與執行之訴之性質相抵觸。

30.º

基於此，鑑於宣告之訴的平常上訴當中有關“喪失的利益值”的規定(《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不應補充適用於執行之訴的訴訟程序中針對每一項獨立的查封聲請所作出的駁回請求的決定，故此，謹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裁定請求執行人提出的上述“上訴聲請”應獲受理並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601條第2款之規定立即上呈。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不認同上述主張(這純屬假設)，則請求執行人繼續提出以下另一依據：

(四) “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的“喪失的利益值”，應為“請求執行人直至目前為止於执行程序仍未能成功獲得清償或執行的金額”

31.º

正如以上所述，執行之訴旨在請求法院採取適當措施以確實彌補受侵害之權利又或直接實現請求執行人針對被執行人享有的一項債權。

32.º

簡言之，執行之訴是為了使被請求執行的金額透過法院直接命令進行的措施從而獲得滿足。

33.º

而在執行情序中，請求執行人為了實現其債權，往往必須適時地針對被執行人於不同的時間點被發現的財產馬上提出一項獨立的查封聲請，而在被請求執行之債權仍未透過執行情序獲全部實現之前，法院於不同時間所作出的任何一項駁回查封請求的獨立決定，事實上均直接地影響對請求執行人在相關執行案中請求執行的整項債權的實現。

34.º

事實上，即使是執行聲請獲接納而被執行人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但倘若請求執行人不獲法院批准其為實現債權而於不時請求法院命令作出的各項查封變賣又或其他針對被執行人的財產強制執行的措施的聲請，則請求執行人請求執行之債權根本無法透過該執行情序獲得實現。

35.º

故此，鑑於“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出現在查封階段，而此時請求執行人之債權仍未獲得滿足，因此有關之“喪失的利益值”並非僅為被聲請查封之財產之價值，而是請求執行人直至目前為止於執行情序中仍未能成功獲得清償或執行的金額(根據卷宗第144背頁之法院帳目，截至2009年10月8日為止尚欠請求執行人之款項為澳門幣2,055,609元，故直至目前為止尚欠請求執行人之款項估計大約為澳門幣3,000,000元)。

36.º

基於此，謹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裁定請求執行人針對“被上訴批示”作出之“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聲請”以及“判處訴訟費用決定”而提起的上訴應獲受理，並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第601條第2款、第604條及第607條第2款a)項之規定，該上訴須立即及分開上呈，具中止效力。

倘若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不認同上述主張(這純屬假設)，則請求執行人繼續提出以下另一依據：

(五) “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 的“喪失的利益值” 存在《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1款最後部分所指之“合理疑問”

37.º

誠然，儘管“被上訴批示”【包括“駁回2019年度現金分享款項之查封請求之決定”(兩名被執行人A及B各澳門幣10,000元，合共澳門幣20,000元)以及“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4UC，即澳門幣3,400元，“駁回上訴聲請之批示”似乎誤寫成“multa”)】涉及的總額為澳門幣23,400元，然而除對“駁回上訴聲請之批示”給予應有之尊重外，請求執行人認為不應單憑此金額作為《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第1款第2部分所指之“裁判不利之利益值”(即，本聲明異議所指之“喪失的利益值”)。

38.º

有需要指出的是，現金分享計劃是2008年由當時在任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出，目的是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抗擊通脹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首次發放為2008年。

39.º

直至上年(2018年)為止，現金分享計劃款經已連續發放了11年，通常於每年的7月份開始分批發放，從不間斷。並且，每年發放的現金分享計劃款項的金額與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承諾的完全一致。

40.º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於2018年11月15日發表的澳門201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一如既往，澳門永久性居民將於2019年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放現金分享款項，而每名澳門永久性居民獲發的金額為澳門幣10,000元。

41.º

本案之被執行人A及B均為澳門永久性居民，有權(又或至少可合理期待該兩名被執行人將有權)收取上述現金分享款項。

42.º

關於現金分享計劃款項是否屬於可被查封的財產方面，各初級法院各法庭均一致持肯定見解；然而，對於該款項可被法院命令查封的最早時間點，初級法院各法庭卻存在兩種不同的見解：第一種見解是在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後，在施政報告當中承諾發放的相關現金分享計劃款項便構成一項“取得期待”，故在發表施政報告後立即可應請求執行人之聲請作出命令查封批示以及通知財政局協助執行有關查封；第二種見解是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當中承諾發放的相關現金分享計劃款項，屬於“政治承諾”，其並非一項“權利”或“法律上之期待”，故最早只能在關於發放現金分享的行政法規公佈後【相關行政法規一般於五月份或六月份才公佈，更曾經兩度(2010年及2015年)於開始發放前一星期才公佈】，方可命令查封該款項。

43.º

誠然，根據關於查封之法律，較早提出查封者之順位優先於較後提出查封者，而正如本聲明異議第3條所述，目前於初級法院第二民事法庭尚有另一執行案亦正針對上述兩名被執行人進程序，該法庭一般會於每年的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獲公佈後便應聲請向財政局命令全數查封上述兩名被執行人將獲發放的現金分享款項（參見附件二之卷宗第204頁、第218頁、第239頁、第258頁、第267頁以及第282頁）；

44.º

換言之，倘若留待發放現金分享的行政法規公佈後才聲請命令查封，則無法及時保障請求執行人之利益（正如過往六年般無法先於上述所指之另一執行案就有關之現金分享計劃款項進行查封）。

45.º

為此，基於訴訟代理人之謹慎以及職責所在，同時亦鑑於不排除原審法官 閣下就現金分享之可被查封之時間點之理解有可能出現轉變，故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747條（對取得權或取得之期待）之規定，申請查封上述兩名執行人於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將獲發放之款項（各澳門幣10,000元）。

46.º

誠然，儘管原審法官 閣下每一年駁回查封現金分享的決定皆為一個獨立的決定，但是，倘若原審法官 閣下於請求執行人每年的現金分享的查封聲請均基於相同的理解而駁回請求執行人每年提出的查封請求（事

實亦一直是這樣)，但卻又以每一個決定涉及的金額不超過澳門幣50,000元的一半為理由駁回請求執行人的上訴，以及將每年在施政報告後立即提出的首次查封聲請視為“重複聲請之附隨事項”並判處請求執行人需支付4UC的訴訟費用（“駁回上訴聲請之批示”似乎筆誤寫成“multa”），則意味著請求執行人每年將不能在施政報告發表後立即獲得對該“取得之期待”之查封，亦一直無法使其請求執行的金額獲得清償。故此，請求執行人實際喪失之利益值並不止澳門幣23,400元，而是自2013年起因未有及時獲得法院命令查封現金分享的批示以致未獲清償的金額總額，以及將來繼續基於相同理由而無法獲得清償的金額總額，和法院就請求執行人每年在施政報告後立即提出的查封聲請所判處的“重複聲請之附隨事項之訴訟費用”。

47.º

故此，鑑於無法預期請求執行人將來繼續基於相同理由而無法獲得清償的金額總額，亦無法預期原審法官 閣下就請求執行人每年在施政報告後立即提出的查封聲請所判處的“重複聲請之附隨事項之訴訟費用”的次數及金額總額，故此，“喪失的利益值”應視為存在《民事訴訟法典》第583條I款最後部分所指之“合理疑問”，故只考慮本案的案件利益值(即澳門幣1,771,710.42元)。

48.º

基於此，謹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裁定請求執行人提出的上述“上訴聲請”應獲受理並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601條第2款之規定立即上呈。

II、關於針對“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提起之上訴

49.º

首先，有需要指出的是，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提出之“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請求”，為針對兩名執行人將於2019年獲發之現金分享計劃款項提出的首次聲請。

50.º

針對上述之“查封請求”，原審法官 閣下在駁回相關請求後，於“被上訴批示”判處請求執行人須支付4UC作為“重複聲請之附隨事項”之訴訟費用（“*Custas do incidente pela reiteração do requerimento. Taxa de*

justiça 4UC – Cfr. fls. 249”)，然而，該“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卻沒有指出任何事實依據或法律依據，尤其是針對請求執行人就兩名被執行人將獲發之2019年之現金分享提出的首次查封聲請是以何事實及法律依據被界定為“重複聲請”，而只是指出參見卷宗第249頁（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b)項之規定：

“一、遇有下列情況，判決為無效：b) 未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

51.º

而從卷宗第249頁(參見附件七第4頁)所見，其是原審法官 閣下於2016年6月3日針對請求執行人於2016年5月30日聲請查封兩名被執行人將獲發之2016年之現金分享而作出的批示的其中一頁。

52.º

儘管該“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中沒有指出任何事實依據或法律依據，但是，從請求執行人對原審法官 閣下引用卷宗第249頁的當中的意圖所作出的推斷，原審法官 閣下有可能認為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提出之“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請求”，性質上與2016年提出的“2016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請求”相同，而又基於原審法官 閣下仍然維持其於2016年6月於第249頁中所持的見解，故此認定請求執行人的“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之查封請求”屬於“重複聲請”，並判處請求執行人需支付4UC的訴訟費用。

53.º

誠然，除對“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給予應有之尊重外，請求執行人對該決定並不認同。

54.º

首先，在上述兩份聲請中所針對之查封對象均指向不同的標的(分別是被執行人於“2016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將獲發放之全數款項”以及“2019年度現金分享計劃將獲發放之全數款項”)，在標的不存在同一性的前提下，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提出之查封聲請必然不會與卷宗第249頁之查封聲請相同，故不具“重覆性”，因此請求執行人並不存在“重複聲請”的情況。

55.º

此外，於2018年11月20日所提出之“查封聲請”，亦不屬於“附隨事

項”。

56.º

關於訴訟程序中的“附隨事項”，雖然《民事訴訟法典》沒有專門訂定“附隨事項”之概念，然而，在學理上有就此給予定義，根據尊敬的終審法院利馬法官 閣下在《民事訴訟法教程》當中指出“附隨事項指在主要訴訟發展過程中，伴隨主要訴訟或在主要訴訟的範疇之內出現的附屬爭議，該等附屬爭議與案件的實質裁判相協調。或者如J.LEBRE DE FREITAS, JOÃO REDINHA 和 RUI PINTO所言，‘附隨事項是一種異常的程序，亦即，超出訴訟程序正常步驟的一系列行為並因此具有偶然性質，其目的在於解決與訴訟標的有某種聯繫但並不構成爭議必需的邏輯連結的特定問題，因有關的邏輯連結已在初始階段由雙方當事人予以劃定。’”(粗線及底線為我們加上，參見附件八之由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終審法院利馬法官所著及經葉迅生檢察長和盧映霞法草翻譯之《民事訴訟法教程》第二版譯本，第163頁)

57.º

尊敬的終審法院利馬法官 閣下除在上述著作中給予“附隨事項”之定義外，還指出“附隨事項”原則上應具備的要件，有關要件如下(粗線及底線為我們加上，參見附件八之由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出版、終審法院利馬法官所著及經葉迅生檢察長和盧映霞法官翻譯之《民事訴訟法教程》第二版譯本，第163頁至第164頁)

“1.需解決的某一問題；

2.該問題與訴標的相比具有附屬性和輔助性；

3.附隨問題具有偶然性或表現為在主要訴訟進程中發生的異常事項；

4.為解決這一事項，有必要進行一項程序 (程序化處理的意思)，言一程序與訴訟本身的程序 (同一程序化處理的意思) 並不相同。”

58.º

除上述學理解釋外，尊敬的澳門中級法院在第159/2001號合議庭裁判亦指出，“在學說及司法見解中，認為就訴訟規定而言，附隨事項是一項打亂訴訟程序正常運作的非常事項，其前提是，所提起的問題相對於訴訟標的而言，其補充特徵或次要特徵，表現為主要訴訟程序中產生的不正常事項，必須組成不同於訴訟程序的一項程序方可解決之。如果當事人參與訴訟之任何行為不構成訴訟正常進展以外的訴訟事項，就不存在附隨事

頃，那麼根據澳門《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15條的規定，並為著該規定的效果，相應地不必課以(司法)費用。”(粗線及底線為我們加上)

59.º

那麼，我們看看：從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所提出之“查封聲請”來看，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條所規定之處分原則，民事訴訟程序原則上需由當事人推動，而在通常執行程序方面，在執行程序的正常進展中必然會出現請求執行人就尚未清償之債權提出查封被執行人財產之聲請，以便能盡快查封足夠的財產以清償債權，故請求執行人在本訴訟程序中提出之查封聲請屬在一訴訟程序內正常出現的事項，不構成訴訟正常進展以外的事項。

60.º

從上述分析可見，無論是根據學理或司法上對“附隨事項”的定義，對於請求執行人於2018年11月20日所提出之查封聲請，有關聲請並不符合“附隨事項”的構成要件，其是在執行訴訟程序中正常出現的訴訟事項，故在不具備“附隨事項”所需要件以及在該聲請乃屬訴訟程序中正常出現的事項之情況下，當然不存在任何“附隨事項”。

61.º

基於此，除對“判處訴訟費用之決定”給予應有之尊重外，請求執行人認為該訴訟費用之判處存在錯誤。

62.º

針對訴訟費用的錯誤判處方面，根據由葡萄牙Ediforum出版社出版、Abílio Neto 律師所著之《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第十五版，875頁，註腳4 (參見附件九第二頁，粗線及底線為我們加上)：“*Contra o erro de julgamento quanto a custas, tanto se pode reagir por meio de requerimento dirigido ao tribunal que o cometeu, como por meio de recurso para o tribunal superior (A. Dos Reis, CPC Anot., 5.º-126; RT, 84.º-165; Ac. STJ, de 1.3.1966: BMJ, 155.º-353), não sendo a reclamação condição prévia e indispensável para a interposição do recurso (Ac. STJ, de 11.3.1969:: BMJ, 185.º-259).*”

63.º

由此可見，針對錯誤判處訴訟費用的裁判，請求執行人既可向作出該裁判的法院提出“糾正訴訟費用的聲請”(《民事訴訟法典》第572條b項)，

亦可直接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而且“糾正訴訟費用的聲請”並不是提起上訴的先決和必不可少的條件。

64.º

另一方面，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602條第2款之規定：“對引致訴訟程序終結之裁判未有提起上訴時，原應與該上訴一同上呈之其他上訴不產生效力，但該等上訴對上訴人有利益，而該利益不取決於前述裁判者除外；在此情況下，如上訴人於十日期間內提出聲請，則該等上訴於該裁判確定後上呈。”(粗智和底線為我們加上)

65.º

根據由葡萄牙Ediforum出版社出版、Abílio Neto 律師所著之《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第十五版，第1062頁，註腳2，上述《民事訴訟法典》第602條第2款(相應於《葡萄牙民法典》第735條第2款)但書部分所指的上訴，包括“在訴訟過程中科處罰款或訴訟費用的批示”(參見附件九第3頁)

66.º

儘管上述《民事訴訟法典》第602條第2款是關於上訴上呈的時間點，然而從該款但書部分之規定所見，在宣告之訴中，只要審理上訴人在訴訟程序中提起的中間上訴對上訴人而言有利益(而根據上述《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第十五版，第1062頁，註腳2，其中一個例子正正是“科處罰款或訴訟費用的批示”)，而該利益不取決於對引致該訴訟程序終結之裁判之審理，則即使上訴人不對終局裁判提起上訴，亦可於法定十日期限內聲請對先前已接納的中間上訴進行審理。在此情況下，法律並沒有要求法院需重新審視先前已接納之中間上訴是否符合澳門幣兩萬五千元之“喪失的利益值”之規定。

67.º

基於此，針對錯誤判處訴訟費用的裁判，似乎沒有應予考慮的理由妨礙其應被第二審級的法院審查。

68.º

綜上所述，謹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院長 閣下裁定請求執行人提出的上述“上訴聲請”應獲受理並應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75條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601條第2款之規定立即上呈。

II – Fundamentação

Passemos então a apreciar a reclamação.

Antes de mais, é de salientar a doutrina do saudoso PROFESSOR JOSÉ ALBERTO DOS REIS de que *“quando as partes põem ao tribunal determinada questão, socorrem-se, a cada passo, de várias razões ou fundamentos para fazer valer o seu ponto de vista; o que importa é que o tribunal decida a questão posta; não lhe incumbe apreciar todos os fundamentos ou razões em que elas se apoiam para sustentar a sua pretensão”* (in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Volume V – Artigos 658.º a 720.º (Reimpressão), Coimbra Editora, 1984, pág. 143).

In casu, esta doutrina autorizada é de se aplicar *mutatis mutandis*, por ser igualmente válido o entendimento nela defendido para a apreciação da presente reclamação.

Portanto, não nos vamos debruçar e pronunciar sobre todos os argumentos, para nós não pertinentes, deduzidos pelo reclamante, limitando-nos a resolver as questões postas pelo reclamante sobre a recorribilidade do despacho em causa.

Como se sabe, é regra geral a recorribilidade das decisões judiciais, sendo considerada como excepção a irrecorribilidade.

Por razões diversas, a lei identifica expressamente quais são as decisões insusceptíveis de recurso.

Dentre entre as excepções, temos a prevista no artº 683º/1 do CPC que dispõe: *Salvo disposição em contrário, o recurso ordinário só é admissível nas causas de valor superior à alçada do tribunal de que se recorre, desde que a decisão impugnada seja desfavorável*

à pretensão do recorrente em valor superior a metade da alçada desse tribunal.

Esta norma faz depender a recorribilidade do valor da causa e do valor de sucumbência.

Expondo a razão de ser destas restrições à admissibilidade do recurso em razão do valor da causa e do valor de sucumbência, Lopes Rego diz:

Temos como evidente que não pode pretender pôr-se seriamente em causa a existência, no ordenamento processual, de limites objectivos à admissibilidade do recurso, estabelecidos para as causas de menor relevância, tendo em conta a natureza dos interesses nelas envolvidos ou a sua repercussão económica para a parte vencida: é que tais limitações derivam, em última análise, da própria “natureza das coisas”, da necessidade imposta por razões de serviço e pela própria estrutura da organização judiciária de não sobrecarregar os tribunais superiores com a eventual reapreciação de todas as decisões proferidas pelos tribunais inferiores – sob pena de o número daqueles ter de ser equivalente ao dos tribunais de 1ª instância e com a consequente dispersão das tendências jurisprudenciais..... cf. “Acesso ao Direito e aos Tribunais”, in Estudos sobre a Jurisprudência do Tribunal Constitucional, 1993, pág. 83.

Está em causa uma decisão que indeferiu a penhora pedida pelo exequente no âmbito de uma acção executiva.

Na óptica do Tribunal *a quo*, o total do valor do objecto da penhora pedida não ultrapassa o valor mínimo (sucumbência) previsto no

artº 583º/1, 2ª parte, do CPC, não é, pois, recorrível a decisão que a indeferiu.

Todavia, para o reclamante, tratando-se de um indeferimento liminar, deve aplicar-se *in casu* a regra excepção à excepção, prevista no artº 395º/1 do CPC.

Diz o artº 395º/1 que *do despacho de indeferimento cabe recurso ordinário, ainda que o valor da causa esteja contido na alçada do tribunal de primeira instância.*

Para Autunes Varela, *atenta a gravidade das consequências do indeferimento, admite-se recurso desse despacho, seja qual for o valor da causa..... in* Manual de Processo Civil, 2ª ed. revista e actualizada, pág. 261.

Compreende-se o grau de gravidade das consequências do indeferimento, pois se trata de uma decisão que “mata à nascença” uma acção, dando lugar à extinção ou à absolvição da instância, até do pedido.

Assim, justifica-se a excepção à regra da recorribilidade independentemente do valor da causa, pois está em causa o direito de acesso à justiça e deve-se procurar não expor esse direito tão fundamental ao risco de ser morto à nascença por uma decisão, não obstante judicial, eventualmente precipitada.

In casu, estamos perante um despacho que indeferiu a penhora requerida pelo exequente.

Trata-se de um acto inserido na tramitação do processo de execução, que visa à individualização e à apreensão efectiva dos bens que se destinam aos fins da execução, preparando o acto futuro de desapropriação e à conservação dos bens assim

individualizados na situação em que se encontram, evitando que sejam escondidos, deteriorados ou alienados em prejuízo da execução – Amâncio Ferreira, *in* Curso de Processo de Execução, 2005, 8ª ed., pág. 177.

É um acto processual instrumental à satisfação do direito do exequente.

Portanto, ao contrário do que está insinuar o reclamante, o despacho que indeferiu a requerida penhora não tem a dignidade comparável com a de um despacho de indeferimento liminar a que se refere o artº 394º, que visa tutelar o efectivo direito de acesso à justiça contra a eventual decisão precipitada.

Assim, bem andou o Exmº Juiz *a quo*, ao decidir pela não admissão do recurso com fundamento na irrecurribilidade fundada na inferioridade do seu valor de sucumbência à metade da alçada.

Passemos então à questão sobre a recorribilidade da condenação nas custas, subsidiariamente suscitada pelo reclamante.

Como se sabe, em regra, o meio de impugnação contra uma sentença é o recurso ordinário para um tribunal superior.

Excepcionalmente a própria lei estabelece meios expeditos de impugnação, dirigidos ao próprio autor da sentença, ao dispor das partes para reagirem contra determinadas decisões inseridas na sentença final do processo.

São exemplos as situações previstas no artº 572º do CPC, à luz do qual pode qualquer das partes requerer no tribunal que proferiu a sentença o esclarecimento de alguma obscuridade ou ambiguidade que ela contenha e a sua reforma quanto a custas e multa.

A propósito da reforma da sentença quanto a custas e multa, ensina o Prof. Alberto dos Reis ao anotar o código de 1939 dizendo que:

“Se a decisão proferida pelo juiz quanto a custas e multa, ou só quanto a custas ou quanto a multa, foi ilegal, isto é, se a parte condenada entender que essa decisão interpretou ou aplicou erradamente a lei, pode ela pedir que seja reformada. Neste caso é óbvio que o meio facultado pelo artº 670º, exerce função semelhante à que normalmente exercem os recursos: visa impugnar a decisão proferida, por erro de julgamento, e a conseguir que seja substituída por outra conforme à lei.

Entendeu-se que para caso tão simples, como é, por via de regra, a interpretação e aplicação da lei sobre custas e multa, convinha pôr à disposição do litigante prejudicado um meio rápido, económico e expedito de obter a reparação do erro cometido.” – cf.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Vol. V, pág. 153.

Sendo embora um meio rápido, económico e expedito de obter a reparação do erro ao dispor das partes, não quer dizer que estas não podem reagir mais se a decisão proferida sobre o pedido de reforma não lhes for satisfatória – artº 592º/1 do CPC.

Nesse último caso, já cabe recurso dessa decisão proferida sobre o pedido de reforma, se os valores da alçada e da sucumbência o permitirem, nos termos do disposto no artº 583º/1 do CPC – *nesse sentido, vide Amância Ferreira, in Manual dos Recursos em Processo Civil, 6ª edição, pág. 60.*

Na esteira desse entendimento, o meio idóneo para reagir contra a

condenação nas custas deve ser o pedido de reforma e não o recurso ordinário directo.

Por isso, não é admissível o recurso directo contra a condenação nas custas.

Ademais, no caso *sub judice*, a parte da condenação nas custas é sempre irrecorrível por ser bem inferior à metade da alçada dos tribunais de primeira instância.

Pelo exposto, bem andou o Exmº Juiz *a quo* ao não admitir o recurso interposto pelo exequente, ora reclamante, do seu despacho que indeferiu a penhora sobre os valores hipotéticos da comparticipação pecuniária de que provavelmente venham a beneficiar os dois executados.

Tudo visto, resta decidir.

III – Decisão

São bastantes as razões acima expostas, cremos nós, para que indefiramos, como indeferimos, a reclamação deduzida, confirmando na íntegra o despacho reclamado.

Custas pelo reclamante.

Fixo a taxa de justiça em 1/4.

Cumpra o disposto no artº 597º/4 do CPC:

RAEM, 31JUL2019

O presidente do TSI

Lai Kin Hong